

■新作聚焦

郭雪波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 捍卫游牧文明的生命与尊严

□王光灿

嘎达梅林是谁?是连环画时代的主角,是少数民族的英雄传说,照例会有无数的影视作品、出版物一相情愿地塑造着符合要求和既定想象的民族英雄,概念模糊,细节淡漠,不由分说地涂抹和塑造了我们的记忆。而在郭雪波这样的蒙古族族人眼里,嘎达梅林的形像无疑要生动丰满得多,是保卫草原和牧民利益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活在蒙古人的歌声里、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沉淀在血液里。作者因为某种神秘的机缘,沿着英雄的足迹,40年的光阴走来,写就一部为英雄招魂,进而为游牧文明正名的史诗巨著——《青旗·嘎达梅林》。

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英雄?首先第一条,即是要明白英雄并不容易被我们认识,隔着岁月的迷障,许多细节被不知不觉地篡改,历史现场离今日越近,越容易受到现实的影响。因此,要认识英雄,除了情感上的认同之外,还要经过艰苦的打捞,深入厚重的史料档案,更要亲力亲为,寻访历史的当事人,收集各种声音,从而破除历史迷障,把正史记载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还原为活生生的“人”,还原历史情境,凸显英雄人物在彼时面对困境、矛盾、艰难,是如何从中突围,最终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的。正是如此,《青旗·嘎达梅林》的作者郭雪波自1968年起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嘎达梅林的故乡达尔罕旗(今通辽市科左中旗)工作,不辞劳苦走访了当年嘎达梅林手下的“炮手”那顺孟和、达林古尔布及嘎达梅林的叔叔、堂弟和侄子,以及几位曾跟随嘎达梅林起义的士兵,甚至神奇巧合遇了原嘎达梅林夫人牡丹。这样厚重而又繁杂的历史堆积起来,沉甸甸压在郭雪波的心里,就为了等待着有一天重见天日。

■看小说

方方《民的1911》 从“王的国”到“民的国”

小说标题《民的1911》(《上海文学》2011年第7期),既得名于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民”的13岁少年;同时也代表了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实现了从“王的国”到“民的国”的变革。

作为正面表现武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小说,方方在叙述中既忠于史实,以大量真实可考的人物事件为基础;又融入小说家特有的艺术手法,通过少年“民”这个虚构的人物,以一种更文学、更人性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人与历史的互相造就。

小说集中描绘了从1911年10月9日起义筹备到10月12日起义取得最终胜利的全过程,出场人物纷繁复杂,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以邓玉麟、杨洪胜等为代表的坚定的革命党人,有赵裁缝等同情革命的普通市民,也有投机军人黎元洪、顽固官僚瑞澂等等,每个人都显现出独特的个性,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地折射出历史大事件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起义中的风云变幻、波涌云诡,在方方笔下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合理的文学想象让历史鲜活起来,充满现场感,使人身临其境,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方方本人从小在武汉长大,历来的作品也多以当地为背景。《民的1911》中随处可见的武汉地名,如花园山、昙华林、胭脂路、小朝街等,显示出作者在扎实的史料积累之外,还深怀着对所处城市的感性认识和特殊情结。

(张予佳)

王十月《寻根团》 命运的交叉小径

王十月的《寻根团》(《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以一场梦开篇,并且全篇有三个梦:王六一梦见去世的父母责怪他“十年不回家”、不管家里的房子被人戳了两个洞。当他随着“百人寻根团”的千亿万富豪们回乡后,看到父母的坟头竟真的被人插了两根画着符咒的桃木桩。在堂兄屋前打盹儿,王六一竟再得一梦,梦中父母指认的“仇家”马老馆挥着宝剑吓退了亡灵。在第三个梦里,王六一梦见亲如兄弟的负有“赤条条”与他告别后,被“青面小鬼”掳走。马有贵正是马老馆的儿子,当初和他一道下广东,现今因“尘肺病”奄奄一息。梦醒来,马有贵果真已撒手人寰,王六一去他家,竟看到和梦中一模一样的木剑,于是骇然逃离……“楚人尚巫鬼”,梦境为这部写实主义品格极强的小说平添了一种幽冥、悬疑的色彩。马有贵的苦难人生和毕光明们的穷奢极侈在小说内外纠结:千万人踏着一条约路南下,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命运的交叉小径究竟由谁来分野?

李健《恩牛碑》 人的卑琐与牛的忠勇

为一头死去的耕牛立碑,并且将之命名为“恩牛碑”——这头牛和它的主人之间究竟有何不解之缘?李健在《恩牛碑》(《绿洲》2011年第4期)中,以不无沉痛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人与、人与牛之间复杂关系的乡村图景。因为当年做村干部时遭到“老张头”的暗算,林四海失去了做人的锐气,“愿意认这个矮”,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可“活活的”祸事偏偏找上他的门,因为,他精心饲养的耕牛“猛子”并不“认矮”,他8岁的儿子星来并不“认矮”。面对诡计多端的老张头,猛子和星来表现出了凛然不可侵犯的骨气和勇气。老张头施计将猛子撞死了,猛子“一返身就将老张头顶在牛栏边的草垛子上”;而对它的老主人林四海,猛子则“摇着尾巴,硕大的舌头轻轻地舔林四海的后背”。当星来遭遇山石滚落下的生命危险时,猛子保护了他,自己却被撞断了脖子……偷偷卖掉猛子尸体的老张头最后“被一尾大黄蜂蜇瞎左眼”,得到了终被报应。人的卑琐、丑陋、软弱与牛的忠诚、“正义”、勇敢在这篇寓言般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凤阳)

在这部书里,郭雪波告诉我们,嘎达梅林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战神,更不是嗜血如麻的辮子,而是普通蒙古牧民的儿子,为了保卫草原不被开垦,捍卫游牧文明的生命和尊严,才不惜放弃军事梅林职务,拉队伍反抗内外勾结的军阀政府和腐败无能的达尔罕末代王爷,最终壮烈牺牲。小说并没有对嘎达梅林的刻意神化,而是将其恢复原貌。写得忠实而不过于夸张渲染,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在当今,有一些人在作品中狭隘地描写草原民族的性格,将嗜血解读为血性,将从林时代的征战法则转化为现代社会中可资利用的权谋。殊不知,成吉思汗决非只会攻城略地征服世界的血勇之士,更是有着深谋远虑,体现着草原民族智慧结晶的哲人;蒙古人也并非只有为羸弱的现代人所津津乐道的血性,蒙古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和后来普遍信奉的藏传佛教,为蒙古人的性格增添了复杂多元的因子。蒙古人的天道自然观念、崇敬万物的萨满文化,在草原民族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中天然地水乳交融,不止体现在对养育自己的草原的誓死捍卫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上。这部书也自然具有了蒙古族风俗长卷一般的动人魅力。在嘎达梅林的故事里,作者还着力彰显和褒扬了这种崇尚自然万物的萨满教文化的神奇力量,书中不遗余力地描写了萨满学师铁喜似乎能感应天人万物的神通事迹,在隐姓埋名多年的老铁喜后人老希头那里,也能见到萨满智慧的闪光,老希头神奇的接骨术,即使在草原上难得一见的兔鹰狼争斗中落败的瞎眼老狼,也寄予了温情和怜悯。这些似乎不经意的描写,由蒙古人的儿子写出,格外贴切动人。

■第一感受

这个“警察”出新意

□木弓

评论家们通常对写警匪的题材有点偏见,认为这类作品有模式化之嫌。然而,专写公安题材的小说家吕铮的长篇小说新作《只有证据》却让我们刮目相看。小说故事很单纯,一个名叫赵顺的普通警察以一种常人难以坚持的毅力,克服了常人甚至是许多警察都难以克服的困难,查出了某公司经济犯罪的证据,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过作家把描写的重心放到人物性格的挖掘上,写出非常复杂丰富的个性,从而突破这类题材长期模式化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性格独特的警察形象。

写警察,少不了坚强、忠诚、智慧、力量这些基本元素。后来作家们觉得应该更加人性化一些,就出现了模仿西方警匪片中的警察类型——有很多缺点,但终将能战胜罪犯。这样的警察似乎更真实,更有入性的血肉,也更可爱一些。其实这样写多了,也会模式化,会失去新意,也会降低作品的可信度。我们读到的大多数这个题材的作品,一般都流行这种写法。《只有证据》虽然在故事人物格局看上去与此模式一脉相承,但作家却能从这些基本元素组合过程中,深刻理解人性以及人性的力量所在,从中找出警察赵顺的独有之处,突出他身上与众不同之处,使这个形象内涵出现了新的素质,从而推动人物性格的完成。

我们注意到,赵顺不仅仅在承受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在承受精神上的折磨。长期对罪犯的艰苦追踪捕捉,加上个性偏内向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如意等因素,使这个神经本应格外坚强的汉子终于出现了精神上的困难,被迫停止工作,被送进精神病院。一边是精神的折磨,一边是罪犯正在毁灭证据,准备潜逃,情况十分紧急。警察内部还有腐败分子设制各种

障碍,阻止赵顺的侦破工作,为罪犯争取时间。作为一个个性执著的警察,赵顺内心冲突一定十分剧烈,因此,更加痛苦难当。他开始坚持认定自己没有病,但无论如何却冲不出精神病院。后来,他慢慢意识到必须承认自己有病,才能突出重围。就是在这种艰难的与自我疾病、与社会偏见较量中,赵顺终于完成了任务,破获了犯罪集团,同时他的人性得到升华。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品质意志无比坚强的人民警察的伟大人格。

作家吕铮以一种普通人的心态,写一个普通的警察故事。他非常真实地写出了普通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突出地表现他们在多重压力下的思想品格和人性力量。他非常注重把人物放到一个典型的环境中去表现,描写这批特殊材料做成的普通人的一面,揭示出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从而支撑起他们性格的骨架,并在细节的展现中组成他们的血肉。小说将主人公内心的活动写得非常生动到位。这些独特的细节支持着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以及性格内涵的可信性,是典型人物塑造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些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写实小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较为娴熟的把握能力。我们当然还不能判断赵顺形象有多高的典型意义,但由于作家的努力,我们读到一个很有新意的警察的形象。

作家在把握赵顺这个人物的时候,正在尝试着摆脱以往写人物的模式,试图找到新的描写方式。作家显然比谁都清醒,他要写的是真正的中国警察,不是警匪片中的警察。也许,赵顺的新意就在于他是真正的中国警察。

■短评

心之所向,许多风景

□赵学成

这个时代的军人侧影?这一共有的精神主题下,既刻画了部队生活的场面和形象,又凸显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再比如“藏在水中的时光”一辑,借河流书写历史,发掘历史轶事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在一条河面前/不必说年轻过什么岁的/不必说朝代更替/河即使干涸了/也同样冲刷着你/你看 岸上/历史峰峦叠嶂/天安 地安人安/有多少心愿和意志/在一条通天轴线上屹立”(《金水河》),这种在历史的打捞中融入某些深邃思索的写法,就有效地揭示了这些河流背后深蕴着的文化内涵。

因此,对于张蒙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这些风景所显示出来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动性与丰满度,还在于它们背后透示出的深层的精神图景——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后者,前者的风景刻画才不会是死的物象堆放,而真正成其为“风景”。在《昆仑山的身影》一辑中,张蒙在巍峨的昆仑之巅致敬了已故的著名诗人昌耀,为一种悲悯、阔大、雄伟、崇高的人格加冕。他这样描写昌耀苦难的心路历程:“昌耀越来越缺乏自信了/感到自己像婴儿一

样不懂事/哭和笑总是不对/意愿总是出错/他只能低头走路 不敢四顾/羞于跟人答话/跟最熟悉的人打招呼/也显得言不由衷”(《倒淌的河》),将一个屡遭羁缚的诗人那种欲诉难言的悲哀,刻画得沉痛而峻切。正是基于这种对昌耀透彻入心的理解,张蒙才能在西部崇山峻岭间找到神圣、纯洁的精神家园,才能在塔尔寺实现某种皈依:“轻轻走进幽深 仰视/心一层层长高/烛火映照如春雨……一种震颤中的静/轻轻闭上眼睛/低下头 合掌胸前/我 静静 拔高/融进圣塔/心 久久叩拜/与天同高”(《圣殿》)。这是心灵的登高,也是精神的朝觐,张蒙在此攀援到了他笔下所有风景的制高点。

张蒙诗歌的界域是较为广阔的,从历史到现实,从西部边陲到南方海岛,从神话传说到日常生活,无所不包。笔者以为,这些诗歌写得最好的,当属凝目日常生活的一些篇什,如《干事》《春天藏迷儿》《五官风景区》《眼皮跳》《写给小石头》等。这些诗歌有贴身的细节,有崭新的发现,有精彩的比喻,有婉曲的想象力,凸显出作为军人的张蒙,怀拥着一颗温润、灵动的诗心。《干事》应当是张蒙通过自己的工作职位对自我所作的一种审视,这种审视因为有了切身入心的真实感受和深厚的生活积淀,而显得格外冷峻、沉实:“一些颗粒 反复练习溶解/在一种叫做单位的液体里/被日夜搅拌/从一个容器倒进第二个容器/摇均/博士硕士学士战士 混合后/都成为干事”。夹缠着比喻的叙述,准确地凸显了生活的处境和心灵所处的位置,饱含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而《春天藏迷儿》《五官风景区》则表现出张蒙灵慧纤巧的想象力:“春天来了 猛一下子/点燃了我家藏迷儿的兴致/我躲到柳丝里面/替地把刚刚融化的雪/抢运到树梢/我躲到桃花里面/给她擦上胭脂/我躲到鸟鸣里面/帮她调正嗓音……”机智、精巧的意象勾勒,赋予了春景宛然目前的动人表情,其中绘写柳絮的“我躲到柳丝里面/替地把刚刚融化的雪/抢运到树梢”,更是将其写活了,神韵毕现,堪称神来之笔;《五官风景区》以大地美景与建筑比附面部五官,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人类五官的布局 and 彼此间的关系,并隐然可见人类精神生态的种种侧面,逼人遐思。此外如《眼皮跳》由人们日常习见的“眼皮跳”现象,勾引出对生活、自我的深长哲思,《写给小石头》由一个初出军营的小男孩,生发出对其未来生命历程的前瞻式想象等等,这些诗歌既有着优美的外在形象的袍衣,又有着真挚淳厚的情感内质,因而通体敞亮,极富感染力。

作为一位军营中的诗人,张蒙的写作并无一般军旅诗人那种显豁、激越的抒情欲望,他温和、质朴,语言清新、率性,在平淡的叙述中时有奇崛之笔,让人訝异于他的才情与智慧。

■创作谈

写下《青旗·嘎达梅林》最后一个字之后,我如释重负。那是2008年9月13日深夜,然后自己仰望长空大哭了一场。

这是长达40年的求索和还愿。从小听身为说书艺人的父亲说嘎达梅林,便有了崇拜这位英雄的情结,1968年19岁时毅然选择去英雄的故乡科左中旗(当年称达尔罕旗)工作。历史真相与社会上认定的历史,有千差万别。为搞清嘎达梅林的全部事迹、历史背景、前后过程、历史和现实意义等等,我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其间查阅了几百万字资料,前后走遍整个科尔沁大地。从1968年在旗档案馆工作时偷偷搜集开始,到1978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几次赴科尔沁调查,再到近几年为真正完成本书稿而反复多次全面展开调查,前后经历了整整40年时间,我也从一个19岁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现在的头发花白的老头。我采访了几十位能找到的当事人和知情老耆如嘎达梅林堂弟孟万山、幸存起义战士那顺孟和等,写下几十万字的共5本采访笔记,那位曾跟随嘎达梅林当“炮头”的“打东洋”刘田仓老人,在我读大学时(1980年)还给我寄来他自己记录编写的“嘎达梅林故事叙述”稿件。他们期盼着我把书写出来,可很遗憾,拖到2004年时我才开始动笔。一直不敢动笔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没有功力完成这部著作,亵渎了英雄们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另一个原因则是,历史需要沉淀,沉淀愈久愈能显现出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那段波澜壮阔、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历史,如蚂蚁般啃噬了我的心几十年,也犹如鞭子抽陀螺般抽了我几十年。今天,我终于可以此70万字的书作告慰他们的英魂了。

现实对历史,有时并不完全公正。尤其面对嘎达梅林他们那段艰苦卓绝的奋争和寻求光明的过程,现实在一段时间内显得那么犹疑,那么捉摸不定,甚至那么复杂而缺乏勇气正视。可毕竟“不容青史尽成灰”,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用心来记述和传承的。《中华英烈大辞典》收录嘎达梅林条目便是证明。“青史几行名姓,北邱无数荒丘”。当本书付梓成书之后,我首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带回科尔沁大地,在嘎达梅林纪念碑前祭烧。在洪格尔-敖包河口祭烧。历史和历史上任何人物,都可灰飞烟灭,然而记忆是永恒的,记录也是永恒的。

准确地说,这是对中国北方草原一百年荒漠化史的一次血泪记录。本书表达了我一贯的生态文化思考,注入了崇尚自然的萨满文化理念。在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当代,地球生态之所以遭到空前破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实质就是人类文化信仰的危机。并非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为写英雄而写英雄,更主要考量其现实意义,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次深度批判和反思。采取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相互交汇创作手法,用结构现实主义方式,着力体现“非虚构写作”,目的也在于此。

我在书中试图揭开几大历史之谜:一、嘎达梅林牺牲之后他的战友、妻子牡丹,为何嫁给“歼灭嘎达仇人”、东北军管长胡宝山并和他联手举起“科尔沁抗日义勇军”大旗,以及牡丹后来的命运;二、嘎达梅林起义后部队编制、规模,嘎达牡丹及其他“炮头”们秘密“报号”资料;三、嘎达起义后的具体行军路线,决定命运的几场大战役及最后一次罕山顶上军事会议如何导致内部分裂;四、嘎达梅林所受的教育情况和启蒙老师——同盟会老战士云灯阿入科尔沁草原办学情况等。

嘎达梅林是代表广大蒙古族牧民誓死反抗反动军阀政府和腐败王爷开垦草原的民族英雄,他造反起义的目的就是反对把放牧的“草地”开垦成农耕的“田地”。这场波澜壮阔的起义斗争,现在看来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说穿了,这是一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生存方式的矛盾。好多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在感叹,倘若当初尊重了嘎达梅林和牧民代表请愿时的意见,那么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如今不会被联合国命名为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北京以及东三省乃至日韩东南亚也许也不会每年遭受十几次沙尘暴袭击了。

正因为至今依然闪耀着指引现实的思想光芒,这便成为我今天写《青旗·嘎达梅林》的真正动力。北方草原现在依旧遭受着空前破坏,开垦之外滥开矿,致使草原地下水水位全面下降,大面积沙化,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究其原因,我们还是不很了解或者误读了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北方草原,不清楚那里的自然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草原千万年来叫“草原”,那里只能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原因很简单,草原的植被只有一尺左右,下边全是几米深的沙质层,一旦开垦头几年还长粮食,往后被翻耕到上边来的土就肆虐了,开始沙化,历史证明草原根本就不适宜农耕。平均年降水只有200毫米左右,仅够草的生长;草原上甚至没有大面积的森林出现,因为树林对水分的需求和蒸发太大,不容易生存,这是大自然法则决定的。千万年来形成的草原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顺应天意地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非常科学而且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

尽管现在退耕还牧还草,治理沙化,可实际执行当中政策落不到实处,那些偷摸开垦草地和开矿破坏生态现象,依旧有泛滥之势。由此下去,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扼杀游牧经济和它体现出的游牧文明,并将彻底埋葬北方草原。

当游动的黄羊群,纷纷血淋淋地撞挂在为限制游牧而设置的“刺儿鬼”铁丝网上边时,我眼里只有泪水——当然,人们依然无动于衷,麻木的神经除了眼前经济利益之外,对一切都已经视而不见。

我们似乎已经永远也不会顺应自然法则生存,永远不及祖先那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了。这不是先人的悲哀,是后人的悲哀。一个有使命感的当代作家,应当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真正的“文学”,也应去功利,抵抗各种诱惑,真正为现实服务,真实地反映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手中的一杆笔,对得起历史和民族。不会为“没天没地没自然、蜗牛角里勾心斗角”(李敬泽语)的小说而自娱。惟其如此,才会具有拉什迪所说的那般“上帝的视野”,俯瞰地球,审视人类。

■书讯

《20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 解读都市女性现代化意识的生成

20世纪是一个风云动荡的世纪。因都市对女性的巨大影响,且因男性对传统的眷恋而难以摆脱旧有的羁绊,女性身上比之男性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都市文化变化的内蕴。中国新文化建立是一项极具颠覆性质的过程,而女性的长期受压抑、被遮蔽使其解放过程尤其呈现为文化极端姿态。一批另类的女学生、女职员、交际花等等往往以“自由”为灵魄,以身体狂欢为策略,以革命激情为导向从事传统文化的颠覆与解构。傅建安《20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一书即抓住了“新女性”系列中具有先锋性的一个群体,即生活在都市中,深受都市文化的浸润,在人生观念、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既体现反封建的现代性又表现出都市“恶之花”的现代病征的女性群体,呈现出较敏锐的学术眼光与较开阔的学术视野。

作者从世纪文学的整体中截取了几个断面版图上的女性形象族群,借此深入研究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关联,即清末民初的启蒙现代性与都市自由女、大上海书写的世俗现代性与都市摩登女、新时期都市文化与女性形象的现代性建构、后现代解构与现实主义重构,也包括审美现代性与后期海派“奇女”张爱玲、苏青等“传奇”女性的以人为本主义精神等。作者抓住各个时期都市文化的重要特征,对相应时期的都市另类女性形象的精神特征进行归纳概括,并对其指认命名。作者认真梳理了她们与都市文化背景间的关系,基本上把握住了她们因都市现代性进程发展而形成的不同轨迹与特质,并结合相关现代性理论阐释到了女性及女性意识现代化生成的逻辑,甚至为中国女性文化乃至都市文化的未来走向提出自己的努力和尝试。

(贺常颖 傅卫红)

四十年的求索

□郭雪波